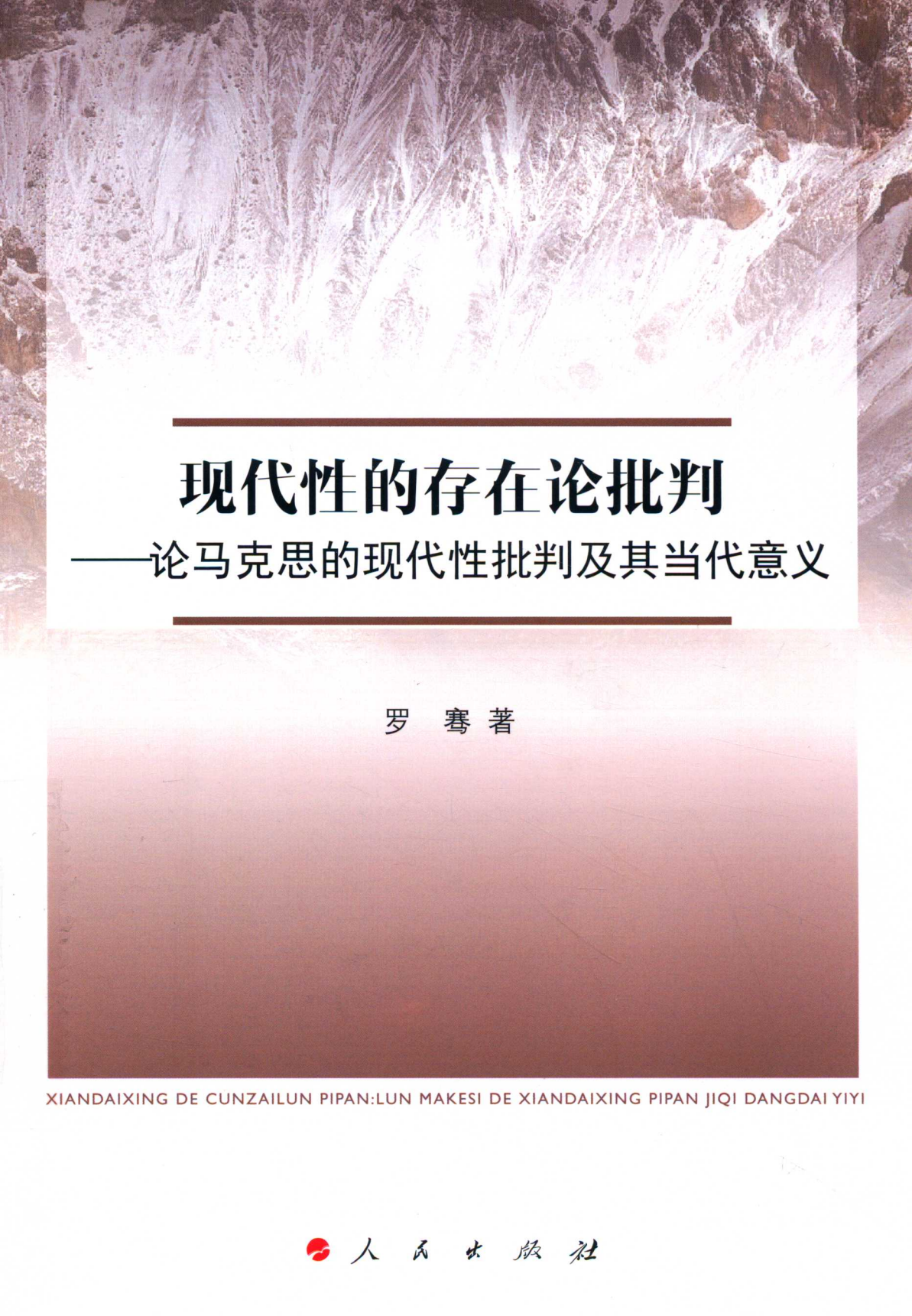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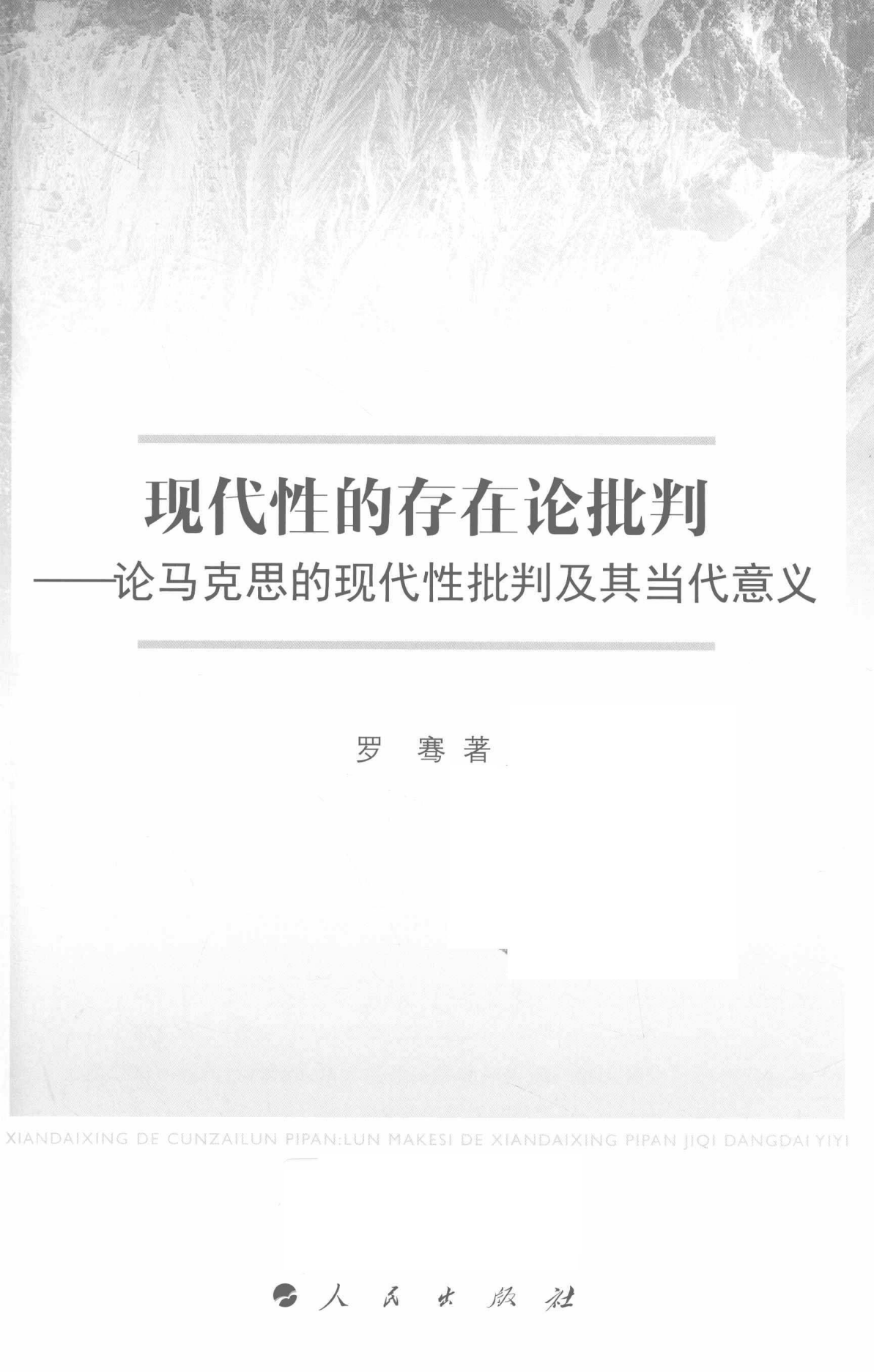
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

——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罗 骞 著

XIANDAIXING DE CUNZAILUN PIPAN:LUN MAKESI DE XIANDAIXING PIPAN JIQI DANGDAI YIYI

 人 民 出 版 社



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

——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罗 骞 著

XIANDAIXING DE CUNZAILUN PIPAN:LUN MAKESI DE XIANDAIXING PIPAN JIQI DANGDAI YIYI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孔 欢
封面设计:吴燕妮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罗骞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01-020486-4

I. ①现… II. ①罗… III. ①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IV. ①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9782 号

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

XIANDAIXING DE CUNZAILUN PIPAN

——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罗 骞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75

字数:364 千字

ISBN 978-7-01-020486-4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再版自序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的再版。初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哲学丛书》2007年出版。原书名变成了现在的副标题。改用《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这个书名,是为了更加直接地表明本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概念及其批判路线,与现代性的观念论批判之间存在基本差异,我们称之为“存在论路向的现代性批判”。

此次再版删除了原版的中英文内容摘要和英文目录,以及作为附录的“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释新原理”一文,增加了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三篇文章。这几篇文章集中呈现了本书的基本思路 and 核心观点。利用再版的机会,对书中的部分标点、文字和语句上的错讹做了必要修订。

记得在某场合听一位学界前辈说过,对有的人而言,博士论文不仅是学术生命的出发点,甚至可能是学术生命的顶峰。我当时就想,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学术人生该是如何的暗淡无趣啊!为此,我总是不断自我鞭策,希望自己的学术生涯不是从起点就开始走一条下坡的路。

尽管博士论文后又出版了几本书,但师友们见面的时候,提到最多的还是我的博士论文,这次再版也是受到他们的鼓励。有时我会感到疑惑:博士论文之后,自己在思想的道路上是否真正走出了几步?到底能够走多远呢?这些问题不时让我从学术的忙碌中警醒过来,不断地检视自己。

当然,我知道这或许是穷尽一生才能得到答案的问题,而作者只是答卷人,读者才是阅卷人。人生过半,我一直在努力,期待不断给出令自己相对满意的答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与本书前后出版的另一著作:《超越与自

由——能在论的社会历史现象学》。从博士论文到现在,其中的联系和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借本书再版之际,再次感谢在本书研究、写作、出版以及相关论文发表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和关心的师友和亲人,是你们一路的帮扶,让我能在学术道路上从容前行,书写人生!

作 者

2018年11月23日于北京

序

张汝伦和陈昕两位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丛书》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据我所知,他们为所要推出的著作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不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不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原创性,他们是决不会出版的。为了维持高品质,他们每年只推出为数很少的几种书,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著作,更是寥寥无几。当我得知两位先生主动与我的学生罗骞联系,希望他把博士论文交给他们纳入该丛书出版时,我十分感慨。罗骞只是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后生小辈”,博士论文也只能算作是他的处女作,我为他能及时碰上“伯乐”而庆幸和高兴。罗骞索序,作为他的导师,我乐意为之。

2000年秋季的一天,罗骞作为我的硕士研究生站在我面前,大概二十六岁的样子,第一印象是他有些腼腆,不自在。后一深谈,才发现这个年轻人不错,具备较好的学术基础,有一种执着精神,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来自遥远的贵州山区,妻子小汪独自在家照顾刚出生的儿子,还要工作,靠她微薄的工资供养包括罗骞父母在内的一家五口人。虽然平时罗骞不大谈起这些,但他面临的压力和困难不难想象。像他这样的处境,没有远大的志向和刚强的意志是不可能选择出远门继续深造的。他来复旦以后,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其学习刻苦与认真的程度,常使我感慨系之,他真的是做到了发愤忘食。加上他原先的理论基础非常好,天资和悟性都不错,学习方法对头,他的学习成绩马上脱颖而出,一些讨论会的发言,以及所写的文章,都表明他是一个可造之才。

硕士阶段的培养一结束,他就无可争议地被推荐免试直升攻读博士学位。由于那时我改带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的博士,罗骞也跟我从西方哲学转到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后来罗骞多次跟我说这一转变对他的学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那时,他的妻子小汪也从贵州调到了上海,他们一家三口总算可以团聚了。但我十分担心,各种压力是否会影响甚至毁了他前途看好的学业。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发现,自他攻读博士学位以后,他的心境更高了,读书与研究一如既往地废寝忘食、锲而不舍,常常在清晨把儿子一送到托儿所,就埋头扎进学校的图书馆里,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

到他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学期,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撰写博士论文究竟选择什么主题呢?我与他共同的想法是所选择的主题必须既有理论价值又具现实意义。无论是在当今中国,还是在当今整个世界,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性。就拿我们国内来说,存在着这样两种对待现代性的倾向:其一,因为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磨难,使我们失去了诸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憧憬起前现代性的生活来,竟然产生了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的圣地”的主张。这样一种观点通过哲学、文学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与西方的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遥相呼应。其二,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西方人走过的道路我们中国人也得跟着走。现代性的正面效应与负面作用都不可避免。我们只能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现代性“洗礼”。只有等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了才有可能解决这些负面问题,倘若现在就着手去解决,只能干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我们总感到这样两种倾向都不可取。而理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出一条正确面对现代性的道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决定他的博士论文以现代性为主题。哪怕这篇论文只是为探索出这样一条道路作出那么一点点的贡献,也会令人欢欣鼓舞。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会从中获得满足与安慰。

那么究竟如何入手呢?罗骞提出是不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来探索当今人类究竟应当如何面对现代性。我拍手叫好。确实,在分析当今中国与世界现代性展开之现状时,必须要有一种理论武器,一种衡量是非的正确标准。而这种理论武器,这种衡量是否的正确标准的形成,显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了找到回答现代性难题的正确答案,首先必须要搞清楚

的是马克思究竟如何面对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解决现代性的难题提供了最丰富的理论资源。就这样,经过反复商议,罗骞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定为《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可以说,这是一个不讨巧的大题、难题,然而,深知这一论题的重大意义,罗骞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和决心。

我要求他必须通读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博士论文一直读到马克思晚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以至《人类学笔记》,必须真正搞清楚马克思在各个时期对待现代性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人云亦云,而应当自己通过研读原著搞清楚。于是,罗骞再次埋头于马克思的原著之中,我目睹了一个年轻人在一些人对马克思的著作不屑一顾的境况下,如何呕心沥血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在这一基础上,我还要求他广泛收集中外学者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著作和论文,把握他人研究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成果,努力使自己站到这一方面研究的最前沿。他都认真地去做了,而且确实做得很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博士论文终于拿出来了。虽然在论文的撰写中罗骞随时与我沟通,但当我拿到20多万字的文稿时,还是吃了一惊。认真地通读全文,我兴奋不已,我发自内心深处感觉到这是一篇优秀的论文,我深信它在理论上必然会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果然,在进行评审时,包括匿名评审在内的评阅专家好评迭至,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所有专家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论文毫无悬念地以优异成绩通过。现在又受到了《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两位主编的青睐。这些都是对他学识的肯定。

那么,这篇博士论文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研究提出了哪些创见呢?我在这里且列举若干。

文章提出,现代性批判存在两种倾向,即观念论批判路线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路线。观念论批判是从现代的意识形态特征,诸如叙事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出发定义现代性,批判现代文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则是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及其对制度和观念的影响方面着手展开批判。这一论断在纷繁复杂的理论思潮中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既为现代性批判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同时也充分突出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地位和性质。

文章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方式对自然、人、社会的普遍中介性,要

求联系生产方式对具体存在的社会性、历史性特征及其本质进行阐释,而不是将存在抽象为实践之外的绝对,历史唯物主义是后形而上学思想视域中存在论最本质的维度。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现代性存在论批判,资本被阐释为现代性的本质范畴,而不是理性、主体性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任务就是揭示资本原则在现代社会的普遍贯穿,它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乃至人们的心理结构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统治。所以说,马克思的批判深入到了现代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基础,而不只是作为“观念论副本”的现代性意识形态批判。

文章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而不只是一种实证的经济科学。现代性的流动性、抽象性、矛盾性、世俗性,以及虚无主义等特征乃是资本原则的“现象”,不能离开以资本为中介的存在论批判得到本质的揭示,比如工具理性的蔓延就不是理性自身的演进,而是资本原则普遍贯穿的结果。

文章提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一种总体性批判,而不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还原论,在资本对所有存在物全面总体化的今天,放弃总体性的批判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辩证历史的辩证批判”,既充分地肯定了现代性的巨大成果,又强烈地批判了现代性的灾难,它以一种总体性的内在批判既区别于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也区别于面对现代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反动立场。

文章提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从不标榜自己是价值中立的科学,而是明确宣布了自己的阶级立场。马克思理论的阶级取向实际上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无产阶级作为“新人”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未来方向,并且是超越资本现代性能动的历史主体。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明显的实践取向,目的在于改变现实,而不只是解释现实,这同后现代思潮中流行的“话语游戏”和“思维操作”具有本质差别,理论批判的任务在于改造历史,而不是改造文本。

文章提出,当今资本全球化真正创造了一个“世界历史时代”,提供了发挥马克思思想批判潜能的成熟的、真实的语境,这不应该是一个离开马克思,而是走进马克思的时代。对于不仅苦于现代性之发展并且苦于现代性之不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思想的基本意义在于提供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指向,使实

践具有走向未来的历史担当意识,而不至于全面陷入资本现代性的泥沼而失去创造历史的可能性。

在答辩中罗骞指出,整个论文从四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上面我只是就某些方面指出了文章的一些亮点,可以说是挂一漏万。比如说,文章提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莱茵报》时期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启蒙现代性”,马克思思想最大的转折点发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思想原则上没有根本的差异,异化劳动批判和后来侧重于所有制的批判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关系,早晚“两个马克思说”是以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为镜像的学科化解读结果,马克思思想不是思想内部的理论革命,而是改造社会的革命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的学者都知道,这些论断在一系列很有争议的问题上标明了作者的见解,具有明显针对性和论战性。然而,文章却举重若轻,没有以醒目的专题化形式展开论述,而是将它们静悄悄地布置到行文之中,使得文章含金量高,内容充实,有读头,耐人寻味。

论文结构、逻辑、表述等方面的特点,不待多言。至于文章的不足,我想指出的是,从材料上看,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关注不多,从内容上看,对马克思理论限度的讨论有待进一步深入,从论证来看,对少数论断的论证不够集中突出,显得分散。好在对这些方面的不足,罗骞自己也有充分认识,在论文获得较多赞誉时,他总是很谦虚地谈到论文的不足和遗憾,他甚至对这么快就交付出版显出犹豫,经我的多次鼓励他才拿定主意。他在论文的“前言”中曾经列举了研究的五个目的,可谓立意高远,尽管论文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遗憾和缺陷,然而瑕不掩瑜,在我看来,这篇论文达到了最初确定的高标准。我为它的面世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乐意向各位读者推荐它!

是为序!

陈学明

2007年3月22日

前言

一、论题的处境及其任务

从人类精神的自觉形态来说,“现代”始于怀疑和反思精神。现代精神批判传统,同时包含着自我指涉,现代社会始终伴随着自我批判。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始以“现代性批判”来标识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形成了影响广泛的“后现代语境”。这一语境,一方面继承了启蒙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又批判启蒙精神蕴含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文化风格等。“现代性”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现代性批判”主要变成了对启蒙“主体性”和“理性”的批判。开始时,对纳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极权主义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同一性进行指认,把它们看成是启蒙现代性的必然结果,“现代性”范畴离开了历史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含义,成为标志时代精神的意识形态范畴。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苏东剧变,不少人宣布“后革命时代”到来,现代性批判进一步在主体性批判、理性主义批判、总体性批判等名誉下,批判“改造历史”的“社会工程”思维,将其指认为进步主义、乐观主义、工具主义等,是现代专制、暴政和战争的根源。于是,对元哲学还原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批判,迅速同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批判结合起来。问题变得越加的宽泛和复杂。

在这样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之中,现代性批判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从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确定的“现代”和“现代性”概念被有意或无意地置换了。同时,由于现代性批判变成了一种观念论的意识形态批判,现代性有时就被阐释为一种思想风格和话语方式,由此,马克思的思想也被轻易

地作为现代性理论处理,或被十分别扭地解读为一种所谓的后现代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的阐释中,缺乏一种总体性的视角。过去被作为学科建制中的三个组成部分来解读,现在,由于实践的挑战,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几乎就要脱落,马克思思想再度被申诉为一种哲学上的思想革命。当然这一过程还伴随着相对主义的阅读策略等等。

我们知道,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学科化解读是通过恩格斯、列宁到斯大林逐步形成的。这种解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现代学科和专业分化的加剧,以这一架构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建制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三个组成部分分别作为基础、运用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线性的因果联系和相互并置的板块。尤其是面对今天变化了的实践,人们采取了对政治立场和思想原则本身进行划界的学理化方式,主要不再从政治立场和阶级化了的哲学路线来定位马克思思想,而是在衰退的政治实践中高扬马克思思想的哲学高度,并且不由自主地放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国内,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被贬为教条,而重新肯定马克思哲学革命性意义的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学科已经全面萎缩,而经济学中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这不正是表明了分化解读中内在统一性的缺失吗?由于现代学科分化的强制,强化了马克思思想的学科还原主义解读。它不是被作为一种纯实证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就是被阐释为一种单纯的哲学思想革命,甚至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政治,列宁“铁板”一块的强调并没有防止后来实质上的分化解读。总体性解读视域的缺失,还表现在对马克思思想与其他思想流派的组合和搭接上,出现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我们无意否定这些思想流派的重要意义和合理性,但它们的局限性在于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细化,甚至是片面的细化,或者是对马克思未涉足或涉足不多的某些领域的发掘或补充,而它们却往往被认为是本质性的替代和超越,马克思思想的问题域或基础性意义在这种揭示中被遮蔽。这种阅读视角的游移在中国还有特殊的表现形式。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争论,可以看成是历史上西方马克思

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辩论的当代版本,理论立场有趣地表现为一种外交视角的转移。

马克思的思想在众多的阐释中漂浮不定,就连基本的理论内核也众说纷纭。雷蒙·阿隆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不难确定的^①。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说,这一现象可以看作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所在。但是,从思想自身的逻辑来看,它也导致了思想意义的严重流失和扭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流失、扭曲和遮蔽总是在不断的“返回”、“坚持”和“重建”之中实现和完成的。这一状况甚至使得任何“重建”的努力以及那个被重建的对象都失去了基本的可信度,并自我消解。

阐释和研究马克思思想面临的这些特殊困难,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不仅涉及释义学的相对性和确定性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经验的历史。由于以马克思的名义进行的社会实践的衰退,这种困难无疑是倍加严重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以后,所有对马克思思想的批判都迅速地汇集起来,成为这样一个命题和基本诉求:“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罪”,而且实践本身证伪了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我国台湾学者黄瑞祺在他的《马学与现代性》中就明确指出:“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原罪’在于它用实践咒语……将政治妖魔召唤出来,闯了大祸,却不能再支配自己用咒符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至今还不知道如何收拾残局。”^②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非政治的学理化,西方产生了各种将马克思思想进行“科学”研究的“马克思学”。国内也出现了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政治意识形态”中获得解放的“学术”诉求,要求研究的“去国家化”。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被消解,马克思的思想被净化为纯粹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不是被剥离,就是被曲解:一方面,“实践”再度被哲学化,变成解决理论对立的理论范式,从而论证马克思在思想领域

①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② 黄瑞祺:《马学与现代性》,允晨文化实业公司2001年版,第22页。

的话语优势,实践范畴被封闭在理论的内在性之中,确保了一种学院化的思想激情对现实的拒斥和反思立场^①;另一方面,实践隐藏在“尊重现实”的口号下,创造历史的主体性被转化为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立场,转化为面对现实的非批判的肯定态度,并以此批判第一种注解是学院的高头讲章,是源于“应然”的道德激情。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思想倾向,隐含的共同基础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实践”理论的所谓失败。实践中的所谓“失败”立即表现为思想话语中的激进主义和实际操作中的实用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中退场。这两种策略似乎使得并且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在知识分子当中还存活着”,“作为变革社会的蓝图,马克思主义完全失去了信任。”^②

由于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实践品性,导致了阐释中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治的紧张。在一种教条主义化的唯我独尊的框架下,的确出现过“爱之欲其生”和“恶之欲其死”的两极对立情绪^③,构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和遮蔽。对这种绝对主义姿态的批判曾经是马克思思想阐释的重要任务,国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内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都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的研究,确立起了较为宽容的理性立场。但是,随着“解构主义”和“释义学”的兴起及其变形、扭曲和随意挪用,能够对抗“霸权”和“强制”的“多元性”与“相对性”宽容开始滑向理解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被简单化了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指引下,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变成了一种实用主义的随意取舍,我们甚至看到了主张市场经济的马克思,建构现代性的马克思,

① 按照马克思批评青年黑格尔派的说法,在此“实践性”变成了“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在马克思看来,“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他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革命乃是实践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哲学,马克思由此批判当时思辨的理论家:“哲学家们反对‘实体’,他们完全轻视分工,即产生实体怪影的物质基础,这只是证明这些英雄们仅仅想消灭言词,而根本不想改变那些一定会产生这些言词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60页)

② Joseph V.Femia, *Marx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3, p.1, p.2.

③ 黄瑞祺:《马学与现代性》,允晨文化实业公司2001年版,第27页。

形而上学的马克思,反形而上学的马克思等,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变成了马克思思想的“幽灵化”和对这种“幽灵化”的辩护。在国内,很快引起了目前关于“原道”与“诠释”之间的争论,这就涉及马克思思想的“确定性”和内在性问题。

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论域是什么,在马克思的各种学科研究中,他关注的核心主题是什么,这一主题如何使他的思想构成一个“总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总体,是硬化的,还是流动的,是机械的还是辩证的?显而易见,马克思思想的阐释,需要从当今的具体语境提出贴切的问题域和视角,以揭示马克思思想的内在性和总体性。

本书以“现代性批判”为切入点,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研究,将马克思的思想和当今的“现代性批判话语”相互介入,通过对当今流行的现代性批判话语进行反思,结合苏东剧变后的世界形势和全球化趋势,为马克思思想的阐释提供现实的理论视角。这实际上涉及两个内在相关的方面,即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探讨现代性问题,以及在现代性批判论域中阐释马克思的思想。我认为,马克思的基本论域就是现代性问题,并且恰恰是马克思清晰地揭示了现代性的存在论状况。因为在我看来,现代性是现代之为现代的基本历史建制,或者说,是现代之为现代在存在论上的本质规定,而不只是一种现代的“世界观”,只有在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中才能揭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基础。以“现代性批判”作为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视角,具有一种总体的特性,可以克服一种单纯学科化解读的局限,并提供出一条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及其性质的路径。同样,通过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阐释现代性,也可以与当今流行的“现代性话语”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对话,以期重建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这就是本文的基本任务。

我这里的所谓“重建”,大体而言,意味着以下几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就现代性批判论题而言,黑格尔在哲学的层次上完成了以“理性”命名“现代”和“现代性”,而马克思通过黑格尔哲学批判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资本”概念重新命名“现代”,进行现代性批判,将现代性批判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相对于“理性”的现代性概念及其观念论批判而言,马克思本身在存在论的意义上重建了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但是,在当今的现代性

批判话语中,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失败”,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批判转向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或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因此,为现代性批判提供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维度,在当下的语境中也具有“重建”的意义;另一方面,就马克思思想解读和反思而言,一些人仅仅从现代学科分化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它被阐释为专业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或关于社会理想的乌托邦政治等,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视域和总体性被忽视,重新揭示和肯定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基本视域,并以此重构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和逻辑,无疑也是一种“重建”;与此同时,由于一些人仅仅从思想风格、精神气质、叙事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定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马克思的理论就被指认为典型的现代性理论或后现代理论、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等。因此,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定位马克思思想的基本性质和意义,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重建”。

所谓的“重建”,虽然包含了某种理论上的“雄心”,但绝对不是推倒了重来的自是和武断,恰恰相反,它是为了表明“理解限度”的一种自觉意识。不论上面提及的哪一个角度,“重建”都只是指向基本的方面,既不是说马克思穷尽了现代性批判的主题,也不是说现代性批判能够涵盖马克思的全部思想。我们只是强调:现代性批判要想切实地得到推进,必须重新发掘并推进马克思提供的思想维度,否则,现代性话语将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观念旅行或无批判的顺从主义。同样,马克思思想的阐释要想走出教条主义的泥沼,从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抽象争论中解放出来,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独特的批判潜力,现代性批判视角的引入是切近可行,并且是必须的。最后指明一点,“重建”来源于这样一种观察和思考:在不仅苦于现代性之发展,而且更苦于现代性之不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性介入及其特定路径,使得问题尤其如此,并且从来如此。这亦即是说,马克思的思想曾经是以一种独特的“重建”方式成就自己,今天,其意义的阐释也就必然是某种方式的“重建”。

二、国内外研究的大致状况及面临的困难

如伊格尔顿说的那样,只要现代性还不死,人们还生活在现代性的矛盾之

中,马克思的思想就会是相关的^①。不论是认可还是批判,“现代性”的讨论总是离不开马克思。这一点可以从国内外的广泛研究中得到证实,正是这些研究,为我们的论题提供了现实的语境和思想资源。当然,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这种相关性的指认,而在于马克思思想与现代性批判如何相关,马克思如何展开现代性批判,这种批判在今天的语境中具有何种意义。

在国外,涉及马克思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比如哈贝马斯、吉登斯、列斐弗尔、詹姆逊、鲍德里亚、德里达、福柯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一论题。但是,直接以现代性批判为切入点,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专题化研究的并不多见。而且,一些以“现代性”为视角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著作,其规范性基础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有的“现代性”是指风格上的“现代主义”;有的则主要指它的启蒙价值定向;还有的更加含糊,一般性地指现代社会理论。比如说, Nancy S. Love 的《马克思,尼采和现代性》(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hn F. Rundell 的《现代性的起源——现代社会理论的起源,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以及 R. F. Baum 的《现代性的医生: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Sherwood Sugden & Company, Publishers, 1988)等,由于对“现代性”这一范畴的规范基础不一样,他们阐释的重心、问题域存在很大的差异。近年来,马克思与现代性的相关性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美国学者 Robert J. Antonio 2003 年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与现代性——关键著作和评论》,主要是从现代性这一视角选编的马克思著作文选和相关评论。台湾学者黄瑞祺的《马学与现代性》等相关著作,对马克思与现代性的关系有较宽泛的研究。国内也零星地见到一些文章,比如说,俞吾金教授的《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

① 特里·伊格尔顿说:“很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竟然会在现代性不死的情况下‘死亡’,这只是后现代主义期望发生的事情。如果后现代主义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现代性确实已经结束,那么马克思主义也就非常可能随之而被废除了。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在现代矛盾里挣扎,如果在这些矛盾得到解决之前现代性不会结束,如果定期发布的关于现代性的讣告是夸张不实之辞,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一如既往地是相关的,当然这和说它是正确的并不是一回事。‘现代性的终结’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伪装成陈述性命题的行为性行为:到底谁想取消现代性,谁有资格这样做,谁要它停下来,目的何在?”([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8—119 页)